

铜罍小议

張懋鎔 (西北大学文博学院)

摘要：铜罍是巴蜀青铜器中颇具特色的容器。从形制来看，属于实用器物。铜罍的传播范围很广，除本土四川外，陕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广东等地均有出土。存在时间也很长，从战国早期直到东汉晚期。

关键词：铜罍；巴蜀；小议

中图分类号：K876.41 **文献标识码：**A **文章编号：**1003-6962(2009)02-0053-02

铜罍是巴蜀青铜器中颇具特色的容器，但令人惊奇的是它传播范围很广，除本土四川外，在陕西、河南、湖北、广东等地均有出土；存在时间很长，从战国早期直到东汉晚期。作为一种地方性的青铜容器，它何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？

已有文章指出，铜罍原本出自巴蜀地区，时在战国早期；随着秦灭巴蜀，铜罍于战国中晚期进入关中；在秦灭东方六国的过程中，铜罍逐渐向各地扩散^[1]。这个分析是正确的。但这主要是指铜罍传播的方式和途径，还有深层的原因则有待进一步分析。

从形制来看，铜罍可谓其貌不扬。从出世到消亡，形制没有多大变化，整体像陶罐，早期个高、腹深，晚期个矮、腹浅；在肩、腹交界处设置单耳或双耳，早期双耳有一大一小者。铸造也很简单，系用两块范合成。铜罍的下腹部和底部有烟炱痕迹，说明它是实用器物。而其实用性正是铜罍大有作为的地方。

首先要关注的是铜罍产生的时代背景。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展轨迹来看，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最早的青铜器，均为兵器、工具、装饰品之类，都是实用器。进入文明社会以后，青铜器被赋予礼仪文化的意义。夏商周时期的礼乐器是当时精神信仰的集中体现，又是宗法制度、等级制度的物化。春秋以后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，青铜器渐渐失去往昔至尊的地位，向日用器物转化，又回归为实用器。设若铜罍的产生在西周或春秋时期，它不会被注重礼制的东方社会看好。正因为铜罍产生在战国早期，流行在战国中期以后，它自身的实用特点恰恰与此时青铜器的发展

潮流合拍，从而大有用武之地。这是铜罍能从四川一带流向全国的重要原因。

铜罍首先为秦国所接纳，则与秦国的文化制度和观念有关。春秋时，秦国还是严格按照“周礼”来铸造和使用青铜礼器。从战国中期开始，秦国改造旧有的青铜礼器制度，吸收先进的中原青铜文化，诸如鼎的形制都有很大变化。对此，有学者推测其原因是商鞅变法后，秦国实行门户开放，加强与中原诸国的联系^[2]。虽然各国都在变法，但只有秦国较为彻底。有学者指出：这方面的依据是，许多东方诸侯国的战国中晚期的大墓，依然有成套的青铜礼器，而这种现象在秦国并未见到^[3]。在中型墓葬中，秦国与东方诸侯国的差别也很明显。战国中晚期的平凉庙庄 M7，墓室面积有 31.4 平方米，仅出土鼎 1（通高 15.5 厘米）、壶 1（通高 29.5 厘米）、盘 1（残破）^[4]；咸阳黄家沟 M43，墓室面积有 23.9 平方米，出土鼎 2（通高 14.8 厘米）、壶 2（通高 29.6 厘米）^[5]。同样是战国中晚期的墓葬，长治分水岭 M25，墓室面积 37.5 平方米（口）~31.85 平方米（底），出土鼎 6（通高 32.5~40 厘米）、敦 2（通高 20 厘米）、豆 2（尺寸不详）、壶 2（通高 43 厘米）、鉴 2（口径 55 厘米）、鬲 3（通高 11.5 厘米）、匜 1（长 20 厘米）、盘 1（口径 36 厘米）^[6]；邯郸百家村 M3，墓室面积 17.8 平方米，出土鼎 1（通高 19 厘米）、敦 1（通高 22 厘米），另有陶鼎 9（最高者 35 厘米）、豆 6（通高 30 厘米）、壶 9（通高 42 厘米）^[7]。两相比较，可见秦墓中出土的铜器不仅数量少，种类少，而且体量小，纹饰简单；相反，东方诸侯国墓中出土的铜器数量多，种类多，而且体量大，纹饰比较

复杂,制作也比较精致。邯郸百家村 M3 虽然出土铜器不多,但仿铜陶礼器数量多,种类多,“体形较大,敦实厚重”,也远非秦墓可比。

总体来说,秦国青铜器在数量和质量上均逊于中原青铜器。器形较小,纹饰简单,铸造较为粗糙。很少出类拔萃的器物。传世的秦公簋,上有长篇铭文,但论品相则一般。这一差别到了战国更明显。如凤翔高庄 M10 出土的铜器,制作草率,日趋明器化^[8]。这一点与铜釜的简陋、粗糙但又实用正相吻合,铜釜入主秦国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。

在秦国墓葬中,铜釜成为常用炊器还有一个原因。这与秦国青铜器组合形式的变化有关。春秋时期,在秦墓中,饪食器的组合是鼎、甗,鼎、甗、簋或鼎、甗、簋,甗为常见之器,这一点与东方诸侯国墓中多见甗是相同的。不同的是,东方诸侯国墓葬中饪食器的组合丰富,除了鼎、甗、簋,还有鬲、簋、豆、敦,而秦国墓葬中几乎仅有鼎、甗、簋,所以甗对于秦墓饪食器的组合来说非常重要。

但是从战国中期开始,在秦墓中青铜器组合形式发生变化,甗的数量减少,同时,形制也有

了很大变化,三足逐渐退化,这为铜釜的介入提供了很好的机会。釜与甗无论在形态还是功能方面都很相似。从此釜取代甗与鼎形成稳定的饪食器组合。

注释:

[1] 陈文领博:《铜釜研究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94 年第 1 期 66~76 页;刘弘:《巴蜀铜釜与巴蜀之师》,《四川文物》1994 年第 6 期 16~19 页。

[2] 陈平:《试论关中秦墓青铜容器的分期问题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4 年第 3 期 58~74 页,1984 年第 4 期 62~71 页。

[3] 俞伟超:《秦汉青铜器概论》,《古史的考古学探索》202 页,文物出版社,2002 年。

[4] 魏怀珩:《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2 年第 5 期 21~33 页。

[5] 秦都咸阳考古队:《咸阳市黄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2 年第 6 期 6~15 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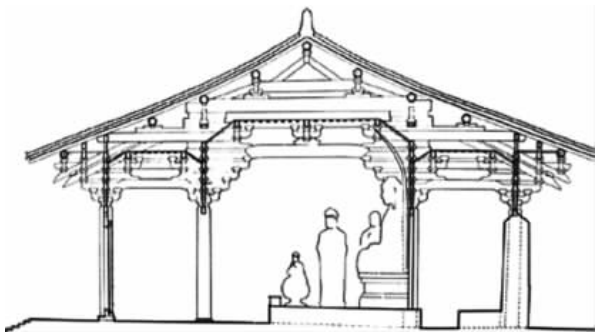
[6]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:《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》,《考古》1964 年第 3 期 111~137 页。

[7] 河北省文化局文化工作队:《邯郸百家村战国墓》,《考古》1962 年第 12 期 613~634 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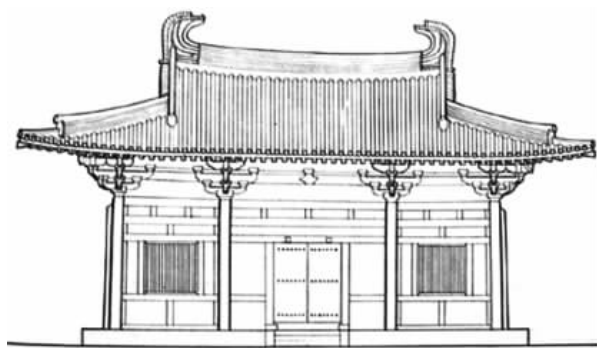
[8] 吴镇烽、尚志儒:《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发掘简报》,《考古与文物》1981 年第 1 期 12~38 页。

(接 90 页)

横连接,以加强整体刚度。清水寺是最典型的例子),是约束变形的关键:传统建筑的门槛,用料粗壮结实,它位于檐柱或金柱之间,把柱子紧紧的卡住,与上部额枋的共同作用,犹如现代抗震设计规范规定的圈梁,使建筑物的整体性能更为加强(图十、十一)。



图十



图十一

6、柱子与柱础(四川叫礅蹬)之间不用嵌入,而是采用较光滑的平接。北方大式建筑采用较为平整的石板或金属蹶板;四川采用硬木作软礅过渡。此种连接方式,能显著减少柱底和柱础表面的摩擦力,避免水平剪切力的破坏。5.12 汶川 8 级地震,成都有明显震感,文殊院藏经楼石柱础受地震水平力的影响,位移 1 厘米左右,但上部结构完好无损,证明传统构造的优越性。